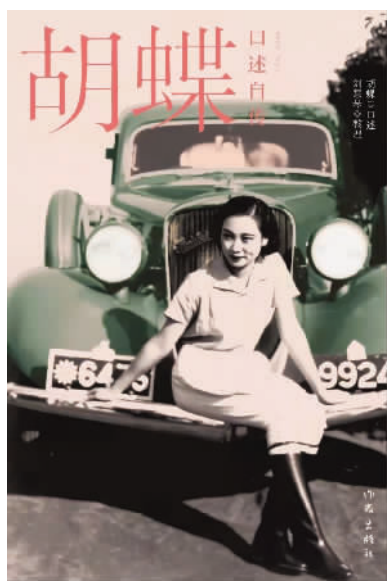


她始终称他“黄先生”

——读《胡蝶口述自传》

沈芸



电影界是势不可挡的潮流，这一句，田汉是很有预见性的。

“早期的电影她比较满意的，如郑正秋编导的《姊妹花》，已成为她的经典之作。……还有《狂流》《脂粉市场》等也都是她认为比较好的影片。她对黄子布(夏衍化名，她一直称黄衍先生为黄先生)一直心存感激，她认为明星公司是在黄先生等加入后才真正拍了一些有文艺价值、有水平的电影。”

“在离开香港到达曲江，她婉谢了李汉魂将军代表国民政府发给她的两万法币赠款，她说：‘当时杜月笙、谷正纲、孔祥熙乃至电影界的黄子布(夏衍)、司徒慧敏等人都是认识并有来往的，戴笠不过是其中一人，也并不是特别的一人……’”

“1987年，我(作者刘慧琴)回国见到夏衍先生，我和我的女公子沈宁是多年挚友，我住在夏公家，犹如家人。夏公很关心胡蝶，频频询问胡蝶在海外的生活起居，并提出请胡蝶回国定居。夏公说，胡蝶是个好人，为中国电影事业的开创和发展做出过贡献。……我向胡蝶传达了夏公诚挚邀请的盛情。我难得见到她如此激动，眼眶里有泪水闪动。”

这几个段落，摘自刘慧琴的《写在〈胡蝶回忆录〉再版前》一文，她是胡蝶生前最后的挚友及回忆录的整理者。我用了几个小时拜读完这本书，阅读的过程是愉快的，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：兴致盎然。

胡蝶对我祖父的称呼保持着黄子布——黄先生这件事，起源于中国电影史上的一次开天辟地的大事件：1932年5月，左翼电影小组进入明星公司担任编辑顾问，我祖父是组长，从那一刻起，红色基因注入、渗透到中国电影业里。这几位左翼人士的政治面目是很清晰的，明星“三巨头”之一、也是钱杏邨的同乡周剑云邀请他们加入“明星”，并且保证不暴露其政治身份，分别都起了化名，这之前，“文委”开会讨论过，且得到了瞿秋白的同意。在这些前提下，胡蝶与黄先生结识了，并有了后面的合作。

“明星”老板张石川的女儿张敏玉始终跟我们家保持着“串门式”的常来常往。她晚年对我讲起来，也是说，明星公司对我爷爷这些新文化人是待若上宾的，他们会去张石川的家里讨论剧本，那时候她还是孩童，已上过大学，我爷爷抱着她坐在身上谈剧本。可见，左翼电影人与公司老板的关系是和谐的，春风化雨的，左翼人士有他们的政治主张，而老板们有他们的“生意经”，在两者不冲突的情况下，坐下来还是客客气气，彼此尊重的。

这样的交情在明星公司结束以后也一直保持着，抗战中，“……时于雾重庆话剧演出，某日，我(黄宗江)化了妆在后台，听人说胡蝶在台下看戏，……事后，与夏公(衍)闲步，他淡淡地谈起，曾在街头遇胡蝶。胡蝶说：‘黄先生(子布)依也来啦重庆?’”

1947年9月3日，我祖父自香港写信给张石川，信的内容是谈对一个电影剧本的意见，写信的年份是推枯拉朽的前夜，经过一场抗战，他们两人的个人境遇和社会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，可是信的抬头依然是“石川兄”，落款是“弟子布”，保留着“明星”时代的痕迹。这封信，张阿姨在临终前交给了我保存。

我祖父在上世纪50年代担任上海市委常委和宣传部长的时候，周剑云仍是他办公室常来走动的“座上客”。这样的关系来往，直到他赴京任文化部副部长。

再回过头来说，当时左翼文化人进入电影界的背景，大时代的潮流是淞沪战争之后，民众的爱国情绪空前高涨。“九一八”后从北平传来的打油诗“赵四风流朱五狂，翩翩胡蝶正当行”，尽管胡蝶公开登报辟谣，但客观上对明星公司造成了被动的困境。电影界内外对《火烧红莲寺》这类怪力乱神影片的深恶痛绝，连胡蝶本人也说：“这是我最想忘掉的一部电影。”同时期的联华影业公司，老板罗明佑摆明了要与此风气划清界限，拉着导演孙瑜拍出了《野草闲花》。这股文艺界的清流，逼得老牌的明星公司终于坐不住了——左翼同样也是张石川的“生意经”。而新文艺运动冲击

北美的滑雪胜地多集中在落基山和内华达山脉，因地理与海拔优势冬季雪量丰盈，滑雪运动盛行。史上共有六次冬奥会在北美举办，其中四次便是在这两大山区的著名滑雪场开赛。

在各类普及性体育项目中，滑雪大概是最具惊险和刺激性的一门户外运动。对于滑雪发烧友而言，它不仅包含着紧张、优美、速动的肢体快感，同时还是一种赏心悦目、放飞自我的心灵享受，这是滑雪文化所独具的审美体验。

作为一个业余爱好者，我在北美滑雪有年，也曾造访过很多滑雪胜地。然而在诸多滑雪场中，最让我难以忘怀的还是加州的猛犸山(Mammoth Mountain)和加拿大的惠斯勒(Whistler Blackcomb)滑雪场了。

加州的猛犸山滑雪场地处内华达山脉的南麓，群峰矗立宛若睡莲，山形地貌错落多姿。正如高尔夫球场的坡形地势对于球手们十分重要一样，地理形态对于滑雪运动来说亦不可小觑。猛犸山的辽阔雪原均匀地向四方辐射，在因约国家森林(Inyo National Forest)中俯冲和伸展，雪道蜿蜒起伏，千变万化，然而走势清晰明朗，急缓难易适度，轻踏雪板，御风而下，如有一种飘飘若飞之感。

常人只是欢喜漫天飞雪，玉树琼花，并不会在乎雪花的形质如何，可是对于滑雪一行却很有一些讲究，对雪花的形质乃至脾性都要尽可能了解。雪有粉雪、粒雪、片雪、亮雪、冰雪、野雪、蓝雪和人造雪等几十种分类，些微差异恐怕只有经验丰富的滑雪老手才能真正体悟得出。须得与雪相知如故，拿捏分寸，方可在板与雪的种种默契中收获快乐。

猛犸山的雪质具有内陆雪的脾性，因海拔高，空气干燥，雪花酥松活泛，有一种白白糖质感，是雪中的上品。这种粉雪充满了近代俄罗斯文学的冬天气味，往往在马蹄和雪橇下飞溅时最见风致。阻力小，任摆布，左右逢源，雪板滑过如微风掠水，银浪轻漾，嘶溜——，嘶溜——，随着悦耳的摩擦节奏，腿关节都酥了。

至于人造雪，俗称面条雪，大抵造雪机碾成的细粉，表面平顺实，可是过度硬带来一丝不确定的诡异，更不消说欠缺的是天堂磨粉那份柔软和自然，只能聊算中品之雪。而冰雪是滑雪者的灾星，是黑色星期五。因其刚硬光滑，与雪板相遇势不两立，不比平地溜冰可以飞旋自如，高山溜冰结果犹如断线风筝，稍不慎栽入山谷，后果不堪设想，实属雪中

下品。至于蓝雪，就是冰川，则因深不可测，人迹罕至，仍保留着古老的沉静与完美，在一些人看来乃是雪中极品，挑战者须有高超的技巧和完备的雪具才好涉足。记得我在加拿大惠斯勒滑雪时，一个错误的拐弯让我误入了霍斯特曼冰川(Horstman Glacier)，当时只见眼前一片碧蓝耀眼，恍如不见底的火山湖，这座庞然大物在高冷中已沉睡了七千多年。通常冰川有自己的小气候，变幻无常，刚刚还是风和日丽，忽来一阵暴风雨，转眼间混沌迷茫，天地莫测，我和滑雪伙伴只能摸索着一步一步前进，那是雪在发怒吧，总要给不知深浅的冒险者一点颜色瞧瞧。

惠斯勒滑雪场堪称滑雪天堂，作为冬奥会的著名赛场，自然是北美乃至世界各地滑雪发烧友们趋之若鹜之地。滑雪场的整体设计深具环保意识，呈现出高度的自然美与人工美的巧妙融合，号称北美最有人气的超大滑雪场之一，幅员辽阔的原始森林也是保护得最好的。

惠斯勒属湿润大陆性气候，森林茂密挺拔，繁茂着道格拉斯冷杉、红柏和龙须松，从山脚一直覆盖到山峰，高寒带稀稀拉拉扭动着顽强的云杉。自太平洋吹来的云雾吞吐缭绕，替滑雪场蒙上一层飘渺虚幻的色彩，这里许多雪道名称也带着一股超凡入圣的仙气：九天、天门、九重天……滑雪者们的身影穿云破雾而下，化作雪坡下的星星点点，那幅画面就像燕群飞散云海，忽而又化作中国画上洋洋洒洒的飞笔点墨。

滑雪者滑着，忽然下起雪来，天空与地面霎时白成了一片。落雪会让滑雪者失去地貌和景深的参照，造成视觉障碍。碰到这样的天气最好是收板歇腿，去雪场咖啡馆小憩，捧一杯热气腾腾的巧克力汁与友人相对，或歪着头独自对着窗外发呆。

滑雪有技艺高强者，喜欢挑战高难度的黑钻石滑道(black diamond trail)，他们往往穿梭于野雪悬崖和猫跳雪墩

声片《歌女红牡丹》里饰演红牡丹的女儿。她在回忆胡蝶时说过，有声片以后，胡蝶之所以站得住脚，是因为她会讲北京话，而阮玲玉却张不了口，走到了末路。另外就是胡蝶的拎得清、会做人，不仅在老板们中吃得开，在片场场工中也很得人缘。

胡蝶的情绪管理能力远远超出一般人，她的会做人跟她的端庄大方的外貌一样有口皆碑、为人称道。甚至，那些口碑给人留下的印象超过了角色，这一点，也恰恰与阮玲玉相反，阮玲玉的默片形象是定格在银幕上的，永恒的。而关于“人言可畏”，胡蝶虽然可以避免阮玲玉式的悲剧，却依然逃脱不了相同的遭遇，除了前面提到的在北平与张学良共舞的打油诗之外，伴随了她一生的就是与戴笠的关系。

吕恩阿姨的丈夫胡业祥是胡蝶的堂弟，她是“二流堂”成员，一直叫我爷爷奶奶“干爸爸”和“夏妈妈”。私下里听她不止一次地说过，戴帽的关系是谣言，私生女更是无稽之谈，胡蝶由于宫外孕流产丧失了生育能力。为此，吕恩还做了一篇专访为胡蝶辩诬。在《回首——我的艺术人生》(吕恩著，中国戏剧出版社，2006年)里，吕恩描述过在重庆大后方时真实处境下的胡蝶。即便是这样，胡蝶仍旧是背负着这一谣言走完了这一辈子，她的会做人的本领都不能帮她躲过这场宿命。

“明星”在“八一三”上海战役的炮火中成了一片废墟，从此，胡蝶的黄金时代也就结束了。她的事业高峰、经济优渥、生活幸福都留在了战前的旧上海，一去不复返。

逃亡、避居、重操旧业、移民、客死他乡……是胡蝶后半生的崎岖，直至洗尽铅华。当刘慧琴转述我祖父对她回国定居的邀请时，她是激动的，毕竟在故国还有一位老朋友在惦记着她。但她是上个世纪老派的淑女，无奈之中依旧保持着有尊严的理性：“‘好’是好，只是几辈子都在这里，我已是个无用的老人，怎能再去增加国家的负担。怕只是梦里几时寻，只能终老他乡了。”

不到两年的光阴，一场人生的大戏落幕于温哥华，“蝴蝶要飞走了……”

2022年大年初一于北京



本文作者与祖父夏衍，摄于一九七〇年代



夏衍和女儿沈宁，摄于一九六〇年代

永远怀念「老小孩」 我的曹景行老师

黄芷渊

曹景行老师是个“老小孩”。他比我大四十岁，好几次一起出差，他看到好玩的都会叫上我，一探究竟。于是，同行的老师叫我们“一老一少”。

曹老师说，或许我们早在上海世博会就擦肩而过，当年我为德国慕尼黑市长夫妇的影展当英文翻译，而曹老师在那六个月期间几乎跑遍了每一个场馆。但直到2016年，我随江迅老师到台湾采访，才初次和曹老师见面。

那是一个雨夜，选前的最后一场造势会。台下，曹老师和江老师撑着伞在拍照。我走到曹老师身旁想自我介绍。他已把伞靠近我，让我和他一起撑伞。我说，我读书时已经在电视上见过曹老师的节目；他说，我们是凤凰卫视的前后同事，他听老同事提到过我，在新闻报道中看过我出境。我心中窃喜。

曹老师随即给我布置任务。他说，咱们来比赛，观察到什么就点评什么，发在朋友圈。电视直播报道向来追求速度，我自认为做得不赖。那晚，我发了近十个朋友圈。但终究还是“输”给了曹老师。用曹老师的话说，他的朋友圈是会把人“淹掉”的。他曾因“疯狂刷屏”发四百条而触怒了“天花板”被微信“关禁闭”，后来他想到一个办法，就是前仆后继、用另一个微信号接着发。曹老师曾讲，接近“开禁”时刻，可以一先积攒几十条要发的东西，时间一到批量齐发，很爽。

听凤凰老同事说，曹老师以前从挑节目选题、列提纲、打腹稿，到上节目，不消20分钟就能一气呵成。有人问曹老师，你又不做微商推销，干吗一天发这么多朋友圈？他说：只能说这是我这种新闻人生性不安分吧，有点自虐。后来，曹老师干脆把微信变成“新闻接收平台”，开了好几个“曹景行正点播报”群，把朋友圈变成新闻信息和评论的发表、转发平台，定时发布新闻。他说，在全球找到100个志同道合“刷新闻屏”的朋友，那全世界新闻都可以在朋友圈里看到了，抵得上一个通讯社。

“老小孩”曹老师有很多绰号。当年有人叫他“新闻雷达”“师奶杀手”，后来有人称他“超级爷爷”。做过纸媒，当过电视名嘴，开办过王牌节目，也在大学教过书，曹老师一直停不下来。他曾和我说，自己不进体制不经商，十年玩一次新的。我之前给曹老师发信息，经常大半夜还收到他回复，但清早醒来，他已经开始发圈刷屏了。我总怀疑他不用睡觉。有一次忍不住问他，他说，自己睡眠习惯很奇怪，晚上睡几个小时就够了，但下午会午休一两次，然后其他时间几乎都在发圈。

我们认识后的这几年，每次他来香港或我去内地，我们都会相约见面。尤其是每年的全国两会，曹老师和江迅老师都是“上会之最”，满头白发仍手捧话筒，是两会最美的风景线。2018年11月，我到上海采访报道进博会新闻，正值吃大闸蟹最好的季节。曹老师推着自行车在地铁口等我，就像爷爷等孙女下课。我背着个

大包书，曹老师一手把我的包放进自行车的挂篮里，领着我回家。他的太太蔡老师等着我们。那晚，我们吃上海菜。红烧肉、烤鸭、熏鱼、蛋饺，还有两只大闸蟹，吃得我不亦乐乎。他俩看着我吃蟹拆肉，像爷奶奶奶般笑眯了眼。曹老师说，以后来上海就多去他们那儿坐坐，那就是我的另一个家。

两年前，得知曹老师生病时，还不敢过多打扰，心中默默为他祈祷。时跑去曹老师朋友圈看看，看到能保持一天发几百条帖，心里就松了口气。去年过年，曹老师说，还在治疗，等到春暖花开再出门。果然不出一个月，已见他外出工作拍摄，精神矍铄。后来曹老师撰文谈到父亲曹聚仁的书《浮过了生命海》，同样“浮过生命海”的曹老师，依旧笑得从容，活得超然，感染鼓励身边的人。

在众多前辈中，曹老师和江迅老师都是会“骂”我的人。我曾兴致勃勃地把刊发在报刊上的文章发给他们，坐等表扬，结果换来一顿批评，一鼻子灰。曹老师曾和我讲，署名了，就是你的东西，多挑战自己，多写不同类型的文字，慢慢形成自己的风格；要试着做别人未必做得到的事情，做点可能有特别贡献的事情。

去年10月，江迅老师突然病逝。曹老师说，闻此噩耗心中顿感疼痛。曾同住一个茅草顶下，曾做过同事，他们是超过半世纪的老朋友、老战友、老兄弟。这才不到四个月。2月11日，曹老师也走了。他和江老师都是拼命三郎，笔耕到生命最后一刻。如今他们相聚了。

曹老师的朋友圈，永远定格在2月7日，64条帖。而我和他最后的对话，是过年向他拜年问好。我们还相约着，等香港通关后见面详聊，再吃大闸蟹。没想到，年还没过完，就传来这个噩耗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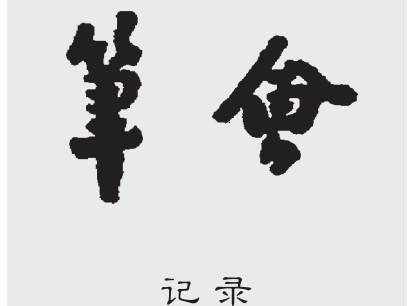
虚怀若谷，高山仰止。永远怀念“老小孩”，我亲爱的曹景行老师。



“文汇报”
微信公众号

滑雪是惊险的优美

王士跃



记录